

现代中国文学 思潮新论

李运抃 著

现代中国文学 思潮新论

李运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新论 / 李运抟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495-0729-0

I. 现… II. 李… III. ①文艺思潮—研究—中国—现代②文艺思潮—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151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建政东路 88 号 邮政编码: 530023)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90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论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的几点思考	1
	一、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打通研究 / 3	
	二、延安文艺与中国当代文学 / 6	
	三、文学思潮与文学体制 / 9	
	四、研究思路与内容设置 / 10	
第一章	延安文艺与左翼激进主义	13
	一、革命文学的劳工神圣 / 14	
	二、延安文艺与工农兵主义 / 19	
	三、赵树理方向替代鲁迅方向 / 22	
	四、政治出发的阶级血统意识 / 26	
第二章	1949—1976 年文学思潮概述	32
	一、首届全国文代会的继承与拒绝 / 33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新论

二、“双百”方针与文艺政策调整 / 36	
三、文学言说与行政干预 / 41	
第三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44
一、非常规现实主义话语体系 / 45	
二、苏联模式的照搬与坚守 / 51	
三、红色经典的叙事实践 / 55	
第四章 文艺批判运动	59
一、特殊形式的文艺思潮 / 60	
二、从学术讨论到政治批判 / 60	
三、领袖的个人作用 / 63	
第五章 “文革”叙事：现代迷信的狂欢与挣脱	68
一、两个“批示”与《纪要》 / 69	
二、“三突出”创作方法 / 73	
三、地下写作的思想意义 / 76	
第六章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文学思潮概述	80
一、政治解冻的开放与制约 / 81	
二、创作的突围与探索 / 84	
三、理论借鉴与批评的繁荣 / 88	
第七章 艰难的启蒙主义	94
一、五四文学启蒙指向 / 95	
二、新时期文学的启蒙重演 / 99	
三、传统启蒙与现代启蒙 / 102	
第八章 孤独到热烈的人道主义	107
一、自由主义作家的人道情怀 / 108	

二、当代作家的人道思想 / 111	
三、人道主义论争及其问题 / 114	
第九章 现代现实主义 -----	120
一、“说真话”的重要意义 / 121	
二、形式探索及其价值 / 125	
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 / 129	
第十章 现代主义文学 -----	137
一、现代派与先锋派 / 138	
二、形式革命的意义与问题 / 144	
三、生存状况的质疑与价值 / 149	
第十一章 文人传记与历史叙述 -----	154
一、文人传记类型 / 156	
二、特殊方式的文学史书写 / 159	
三、集体记忆与个人言说 / 165	
四、还原历史的努力与艰难 / 171	
第十二章 20 世纪 90 年代至新世纪文学思潮概述 -----	176
一、文学的市场化状况 / 177	
二、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 / 181	
三、关于“泛政治化”问题 / 186	
第十三章 欲望书写面面观 -----	191
一、欲望与文学 / 192	
二、欲望书写的评判 / 195	
三、欲望书写的原则 / 200	

第十四章	女性文学：矛盾而尴尬的现代诉求	204
	一、反叛与制约 / 206	
	二、回归自身的书写 / 211	
	三、走向平稳与多元 / 215	
第十五章	生态文学：迟到的生存醒悟	222
	一、普适价值与别样国情 / 224	
	二、如何看待本土环境文学 / 227	
	三、历史语境问题 / 231	
	四、生态文学功能的有限性 / 235	
第十六章	底层叙事：新时代的焦虑与困惑	240
	一、关于“底层”概念 / 242	
	二、底层叙事的意义 / 246	
	三、底层叙事的问题 / 255	
第十七章	少数民族文学的魅力	263
	一、三个基本问题 / 264	
	二、一体化时代的透露 / 269	
	三、多元化时代的异彩 / 274	
	四、对中华文学的贡献 / 279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的几点思考

人文思潮的形成都具备三个相关要素：一是有较明确的价值观念，即形而上的指导思想；二是要有实践，包括各种言说和相关活动，这是具体支撑和事实证明；三是有过程，包括缘起、发展、成型、结束或暂时消歇。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为例，作为近代欧洲划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其指导思想明确：它借助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人本主义与现世意识来反对中世纪封建教会统治和神权意识，以理性反对愚昧，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提出了“人是中心”的鲜明观点；而单看思潮中的文学事实，除但丁《神曲》的发为心声，如有薄伽丘《十日谈》、拉伯雷《巨人传》、蒙田《随笔集》、塞万提斯《堂吉珂德》和莎士比亚戏剧等诸多经典的支撑；从形成过程看，先在14世纪到17世纪初的意大利展开，后来波及欧洲各国。此外，从传播范围、流行时间和历史影响看，思潮还有规模大小、时间长短、意义轻重和影响不同的差异。如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改变了近代欧洲的文化思想，而且直接促成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发生。“科学理性”、“天赋人权”、“自由天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启蒙思想，对后来整个世界的思想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过很多文学思潮，无论大小都有这些要素构成。有些重要思潮如启蒙主义、左翼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新论

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等尤其明显。拿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来说,它既是文学运动,也是新文化的主导性文学思潮。张扬科学与民主、寻求现代理性是其核心观念,由此有着鲜明取向——如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倡导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如周作人主张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而鲁迅小说、郁达夫小说和冰心等人的问题小说,白话文诗歌运动和郭沫若等人的新诗,“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众多文学社团的成立,对“学衡派”、“甲寅派”等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斗争,大量译介外国文艺作品等,则是事实支撑。从过程看,“文学革命”从1917年到1927年进行了十年,历史影响则延续至今。值得注意的是“文学革命”这种大思潮的构成与内涵往往很复杂。比如内含的文学观念并不完全一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有更多的社会政治考虑,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则注重文化变革的思考。同时还存在分支性思潮,如“文研会”的写实主义和“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即大的文艺思潮走向里面,往往又存在有所区别的小的文艺思潮。

思潮形成的三要素缺一不可,思想观念却是首要所在。思潮就是思想潮流,没有思想无所谓思潮。但也因为思想所在,因为思想的复杂和多元,思潮就有价值取向的差异,这也往往导致了不同命运。有的思潮一时之势,有的思潮影响深远。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很多文学思潮,观念就存在种种差异,也出现了各种结果。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差异与结果涉及复杂社会现象,包括文化、政治、经济、审美心理、历史变迁和时代状况等。显而易见,包括文学思潮在内的人文思潮,都是一种涉及文学内外诸多问题的复杂现象,这就给人们提供了多种探讨的可能和各种言说的空间。

也因为如此,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虽然已经很多,但依然有很多言说空间,尤其是当代文学思潮。这不仅由于“当代”是个进行时态,种种新的文学现象需要追踪,还因为不少历史问题需要探讨和重新理解。如这些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很重视“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百年格局中,现代文学思潮和当代文学思潮的传承关系如何?当代文学思潮究竟体现了哪些思想特征?哪些文学思潮更具有文学意义?为何有些有价值的思潮命运短暂,有的错误思潮却能长期蔓延?已有研究中,是否还存在误解和局限?如此等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鉴于上述情况而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一、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打通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包括三个时代:清末民初的近代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现代文学,共和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近代文学情况比较特殊。作为传统文学流脉和现代文学引线,近代文学总是被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分而治之”。鉴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诸多方面的历史关系及其延续性,特别是现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的现代诉求、作家的跨时代和文化思想的密切关系,1985 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提出了“20 世纪中国文学”概念^①,提倡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此后不少学者也将 20 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文学发展史来思考。“20 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成为文学史流行术语,“打通研究”也成为学术潮流,并且涉及整体史、思潮史、创作史和文体史等。整体史,有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等主编的“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文体史,有严家炎等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陈平原的《20 世纪中国小说史》、冯光年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和创作意识方面,有殷国民的《20 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黎山晓的《中国 20 世纪文学思潮论》、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唐正序、陈厚诚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等。以严家炎为主编的“世纪中国文学编委会”所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更是规模可观,推出了十多本专著,不少选题也新颖,如《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等。诸如此类文学著述为数不少。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主要还是体现在现当代文学的贯穿性研究上。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新论

无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史还是其思潮史,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它们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这种直接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关系是无法割裂的。

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虽然是两个大时代的文学,它们之间却存在难以分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体现在文化观念、政治意识、社会思想和文学遗产等知识谱系的延续方面,还体现在活生生的文学主体方面,比如研究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田汉、沈从文、萧乾、艾青、朱光潜、钱钟书等一批跨时代的文学家,就不能不连接他们新旧时代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很多现象尤其是思想争论,如左翼激进主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思潮,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阶级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都涉及历史渊源问题。

寻根溯源的打通研究固然必要,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最普遍的问题是,打通研究往往变成了不同文学时代的线性组合。即研究者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纵向发展作为历史线路,在“20 世纪”名称下将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组合起来。我们不难发现,这类著述的集体编撰现象普遍,而实际是以研究者专业所长(或现代文学或当代文学)进行分工,然后合作(将不同时代的文学研究成果加以组合)。这就导致这类著作具有明显的汇编性质。很显然,这类线性组合研究并没有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予以融会贯通,没有真正揭示出不同文学时代的内在联系和复杂差异。如果说汇编性的组合研究也需要,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打通研究。

仅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打通研究来说,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要注意研究对象历史延续方面的代表性和可行性。也就是应该关注那些确实既具有历史贯穿性又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现象。就文学思潮来说,如启蒙主义、左翼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就值得特别关注。打通研究不能过于笼统,应该从具体文学现象出发,由此才能更切实地开掘相关文学现象的内在联系、历史发展及时代异同。如新时期启蒙重演与五四启蒙主义的关系,两个时代的启蒙意识有什么差异?如都是追求女性独立自主的女性写作,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和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有什么异同?如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究竟有哪些演变特征?原因何在?无论是专题研究(如思潮、流派、理论、文体、作家心态等),还是对中国现当

代文学发展史作整体思考,都应该注意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不必面面俱到。

其次,作为具有历史意识的打通研究,要特别关注时代转折问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转折带来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状况的变化,对文学影响实在太太,甚至导致天壤之别。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真是不错。虽然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很多现象具有历史延续性,但历史不可能重现,历史延续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绝不是一张历史时间表的关系,而是涉及文学的时代性质的重大问题。也正是由于时代性质的差异,两个文学时代才呈现了各自状况。

中国现代文学性质,以往的权威解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新时期后逐渐出现了新说。如钱理群等认为“现代文学”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②。不管怎么界定,有个事实毋庸置疑:现代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分化状态,国家权力对文学的控制始终未能集中。如1917年到1927年的“文学革命”时期,社会混乱,军阀割据,北洋政府只是过渡性国家统治。权力统治没有集中给思想言说提供自由空间;1928年至1936年是国民党政权从建立到相对稳定,同时危机四伏的时期,有研究者认为国民党政权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思想文艺方面并未形成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独立力量,因此该时期成为多种文学思想并存和竞争的时期,文学主潮变得空前政治化,如“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的成立及其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左翼文学兴起的同时,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及其他多种倾向的文学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③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则是战争状态制约下的文学分割时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形成了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范围格局。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和地理范围,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分化状态。

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发展过程,虽然新时期和前二十七年差异极大,但其性质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如通常确认中国当代文学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对此作过详尽解释。该书1963年和1964年分上下两册出版,198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本。由于是“文革”后修订,该书对极“左”思潮有所注意。但对社会主义文学解释未有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新论

多大改变。对党性、阶级性的解释依然如故；对为政治服务则变通说明，依然强调政治意识，只不赞成成为具体政治工作束缚；服务对象除增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不再排斥知识分子外，诸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等基本是老话。这些问题在该书第二章即“文学的阶级属性与服务对象”中有详细解释。因为时间问题，《文学的基本原理》涉及新时期文学有限。以后出版的教材逐渐增加新时期内容，但社会主义性质还是无人否认，至多说它以社会主义文学为主旋律而伴有其他成分。

给文学历史定性，存在角度切入与评价尺度的差异问题。如说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这是从社会政治和社会制度出发的定性。当然也可从文学语言、文学形式、文学思想等方面解释。但无论怎样定性，可以肯定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时代差异确实太大。前者的长期分化状况和后者的长期一体化（如前二十七年文学）有天壤之别。只看一个事实就可知这种时代差异：不少兼跨现当代的文学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朱光潜、钱钟书、刘大杰、游国恩、以群等，他们都曾是那个时代的新文学骁将，新中国成立后则似乎缺少了以往的思想锐气。新时期文学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文学，一体化现象虽然不再突出，但文学的体制化问题仍然存在。

社会政体对文学的改变实在重要，大一统政体模式导致了文学体制化，影响到文学的全面行进，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运动、文学创作、文学出版、文学接受等。打通研究必须注意两个文学时代的差异。研究文学思潮就更要注意历史与时代的关系。

二、延安文艺与中国当代文学

我们通常将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视为中国（大陆）当代文学诞生标志。1917年到1949年文代会前属现代文学时代。按这种划分，中国现代文学有30年历史，中国当代文学至今走过了六十余年时光。以社会政体更迭划分文学时代，也是划分文学史的通则。但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一

直有种看法,即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起点应推至延安文艺时期。因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延安文艺是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周扬曾说延安文艺是继五四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这种从政治需要出发的看法姑且不论,但延安文艺确实不仅继承了左翼革命文学传统,而且进行了彻底的规范和集中。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它对新中国文艺思想的“一锤定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虽是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的“三分天下”,但唯有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确认的文艺思想直接进入新中国文艺,并且完全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总体方向。用周扬的话说,它是“新中国文学的源头”。

我们可以看看首届全国文代会对延安文艺思想的高度肯定。大会所有发言中,具有文艺家和文艺领导者双重身份的周扬和茅盾的报告至关重要。评价解放区文艺和国统区文艺的表现,周扬褒贬鲜明,茅盾相对温和,但赞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则都是两个报告的核心主题。周扬从多个方面阐释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指导下的“新的人民文艺”后,斩钉截铁地宣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定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④周扬这段话被不少教材引述过,确实显示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当时中国文艺思想的绝对地位。“完全正确”的绝对判断,意味着新中国文艺从此将行进在思想高度统一的轨道上。所有文艺工作都必须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唯一指导。至于周扬报告中强调文学批评“必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当然也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全面认同。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新时代最高权威的文艺思想并“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无疑是首届全国文代会标志性的思想收获。

延安文艺思想对当代文学的引导作用还体现在历史清理方面。历史清理,除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各种思想的重新评价,还体现在文艺批判运动中,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资产阶级红学观”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主要就是历史清理。20世纪50年代“绿皮书工程”对历史作品的“改写”也是如此。杨义专门分析过当时的“改写”情况,有些情形确实令人啼笑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新论

皆非：“……郭沫若仍然采取主动的弄潮儿的姿态。他在一些关键的观念上修改了早期的作品，因而也修改了他早期的思想文化形象。本来，他1928年版的《沫若诗集》，把《女神》中的《匪徒颂》混杂地歌颂资产阶级学者罗素、哥尔栋和列宁的地方，修改为歌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巨炮之教训》中借列宁之口，呼唤着‘为自由而战’、‘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修改为‘为阶级消灭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为社会改造而战’，——这就已经给一些批评家造成错觉，仿佛他在五四时期已经追求马克思主义了。老舍在1955年修改出版《骆驼祥子》，做了三个方面的重要修改：1. 在当时谈‘性’变色的气氛中，对祥子与虎妞、祥子与暗娼夏太太、祥子与下等妓院‘白房子’的‘白面口袋’之间的性引诱、性心理和性行为暗示等文字进行成段的删节，其中不乏相当微妙的笔墨，都作为‘不大洁净的语言’舍弃了。2. 对‘革命者’阮明的无赖、变节和死亡的情节全部删去，大概是担心被人猜测为影射共产党，因而在新版中就根本没有阮明这个人存在。3. 删掉结尾的一章，因为这章写祥子堕落成‘文化城中的走兽’，在吃喝嫖赌的深坑中打滚，有丑化劳动人民之嫌。其实这一删节在1951年已经开始了，只不过1955年删得更彻底。曹禺则将《雷雨》结局改为周萍、周冲、四风都没死，以阶级学说消解了悲剧。”^⑤诸如此类的历史清理，可以说都是为了巩固与强化延安文艺思想的举措。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关键是政治至上的意识规范，它使中国文学走上一条服从政权意志的道路。这种配合社会制度、阶级斗争和政治任务的功利文学，成为特殊的文学话语体系，形成了特殊审美原则，也成为共和国主流文艺思想依据。延安革命文艺思想对很多作家的心理影响可谓刻骨铭心。《三家巷》在红色经典中是较有个性的作品，曾因此遭到批判，但作者却有如此回忆：“1942年在延安整风时，我就开始酝酿这书了。整风时，我们学了‘中国革命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国革命是在两条道路的不断斗争中前进的：一条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虽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把最广大的人民发动起来，使革命取得胜利。我就想写本书，将这个过程反映出来。延安整风时，没有什么材料，当然不可能写出来，只是有个想法而已。经过15年的酝酿，到1952年，我就开始写作

了。”^⑥欧阳山这种情况在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作家中是普遍现象。而与延安整风运动无涉的国统区作家,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也都是以延安革命文艺思想为指导。

延安文艺思想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诞生,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思想源头。

三、文学思潮与文学体制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不能不注意文学言说与文学体制的关系。

以往对中国当代文学政治先行和极“左”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些年不少研究者都很重视文学体制问题。文学体制是对文艺团体、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的组织化管理。集中管理,能够有效推行意识形态。中国现代文学由于始终处于分化状态,文学言说与体制关系相对松散,对于文化事业体制化的当代中国则比较密切。

比如关于十七年文艺思想状况,人们常常谈到“双百”方针和文艺政策调整,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反左”曾给文艺状况带来希望和生机,特别是出现了一些个人言说。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双百”方针还是文艺政策调整,都与当时文学体制相关。如“双百”方针是来自上级号召。1961年至1963年的文艺政策调整时期召开的几个重要会议也是如此。如1961年6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些著名会议对于当时文艺事业和知识分子当然是一种福音。但这些会议的召开及主题,都由相关的组织出面,并且基本由领导定调,如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的出席和讲话。尽管是难得的调整,却还是来自文学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安排。这也包括三次全国文艺批判运动。

文学体制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一方面可以保障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一风吹”问题。如1962年9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改此前态度,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且强调“阶级斗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新论

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强化阶级斗争必然涉及文艺。结果就有了康生的表演(把李建彤的长篇传记小说《刘志丹》打成“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也有了毛泽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批示。如此,上述几个文艺政策调整时期的著名会议成果也就付诸东流。

“文革”十年的主流文学,这种体制话语的问题更为突出。

毫无疑问,新时期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宽松的思想环境。但体制话语对文学言说的控制依然存在。如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尤其是邓小平出席并作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让众多文艺工作者欢欣鼓舞。有研究者称,这次文代会是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学合作的“蜜月”时期。然而“蜜月”的长短也取决权力意志。如1981年对白桦电影剧本《苦恋》、中篇小说《飞天》、社会讽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和《在社会的档案里》及《女贼》进行的批判,1983年至1984年中国文艺界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都能证明这点。当年人道主义讨论本可更深入,却以胡乔木名义发表的长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而终止,也更能说明体制话语对文化思想和文学言说的制约。我们不难发现,无论理论含量如何,无论是否属于学术讨论,包括新时期以来各种政府文学评奖活动,体制倾向也非常明显。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茅盾文学奖”,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鼓励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长篇小说作品。”且不说具体评奖过程和评奖结果如何,至少从指导思想的话语看是有明确前提的。文学思潮与文学体制的关系及其产生的现象,是我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不能不注意的。

四、研究思路与内容设置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对某种文学思潮如启蒙主